

文物背后的历史

黄黎 陈明 著



APSTERN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物背后的历史 / 黄黎, 陈明著.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7-5336-5908-0

I. ①文… II. ①黄…②陈… III. ①历史文物—中国—通俗读物 IV. ①K8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50944 号

书名: 文物背后的历史

作者: 黄黎 陈明

出版人: 朱智润

责任编辑: 王竞芬 责任印制: 何惠菊 装帧设计: 陈熙颖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教育出版社 <http://www.ahep.com.cn>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编: 230601)

营销部电话: (0551) 3683010, 3683011, 3683015

排版: 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合肥晓星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 335871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6.75 字数: 150 千字

版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36-5908-0

定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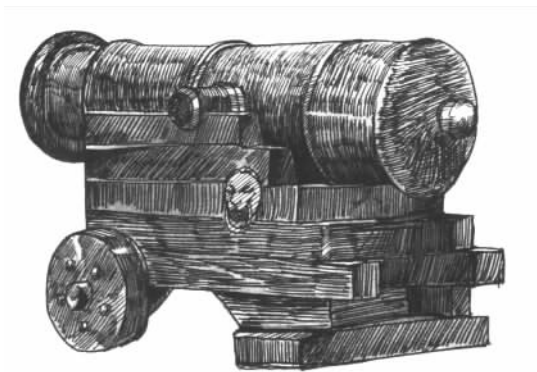
目 录

- 001/邓廷桢、关天培监制的虎门大炮
- 007/蔡锷将军的指挥刀
- 014/京师大学堂的牌匾
- 018/为五四运动印制宣传品的印刷机
- 023/李大钊就义的绞刑架
- 029/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课桌
- 034/江岸京汉铁路工会会员证
- 040/毛泽东照相时戴过的八角红军帽
- 044/吉鸿昌将军的瓷碗
- 049/在响堂铺伏击中缴获的日军钢盔和饭盒
- 053/“狼牙山五壮士”之一宋学义的“坚决顽强”奖章
- 059/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的 X 光机
- 064/国际友人马海德的卫生包
- 069/梅汝璈大法官在东京审判中所穿的法袍
- 074/李公朴烈士的血衣
- 079/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时用的发报机
- 086/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刘伯承使用的单筒望远镜
- 092/华东野战军在孟良崮战役缴获的美制 M1 卡宾枪
- 097/淮海战役中缴获的黄伯韬的手表
- 103/淮海战役中的小推车
- 108/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渡江战役中使用过的木船



- 11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选票箱
- 119/开国大典上使用的话筒和中央人民政府印
- 126/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碑
- 131/研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手摇计算机
- 137/美国总统尼克松送给毛泽东的礼品——月球表面碎石、美国国旗
- 143/邓小平访美戴的牛仔帽
- 149/宝钢开工纪念牛
- 156/许海峰获得的中国第一块奥运会金牌
- 160/中英签署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时用的国产台式英雄金笔
- 166/中葡澳门问题谈判时使用的国旗
- 171/南极上空飘扬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 175/台湾老兵何文德的“想家”夹克衫
- 180/蒋纬国赠谈家桢的 CUBOY 收音机
- 185/邓小平南行中坐过的椅子
- 189/多哈会议宣布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使用的木槌
- 195/北京奥运会的祥云火炬和珠峰火种灯
- 201/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缶
- 205/中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战斗机—歼—10
- 210/后记





邓廷桢、关天培监制的虎门大炮

自从康乾盛世之后,清王朝逐渐走向衰落。18世纪末期,英国对中国大量输入鸦片。鸦片开始由药材变为以走私买卖为主要形式的毒品,大量非法输入中国。鸦片俗名叫大烟,含有大量吗啡和尼古丁,是一种吸上了瘾就不易戒除的毒品。源源输入的鸦片,不仅在生理上、精神上毒害中国人民,而且使白银大量外流,导致中国敝民穷。

对于鸦片的危害,清王朝的统治者早有认识,乾隆时曾严令国内商人、官吏不得贩卖鸦片,违者处以徒刑。嘉庆时也屡次颁布禁烟令,对吸食贩卖者的刑罚亦不断加重。然而,由于清王朝的吏治腐败和外国鸦片烟贩的破坏,这些禁烟令几乎形同虚设。

到19世纪30年代,大量鸦片趸船停泊于外洋,吸食者上自王公大臣,下至庶民百姓,遍布各个阶层。趸船是一种平底匣形的非自

航船,通常固定在岸边作为船泊停靠的“浮码头”,供装卸货物及旅客上下船用。为了便于走私鸦片,外国不法商人在中国东南沿海停泊许多大型鸦片趸船,每艘可载鸦片 1000 箱左右,国内的奸商们凭提单到趸船取货,自雇快船将鸦片运回转售。

道光帝即位之时,正值清王朝日趋衰落,内外交困,鸦片贸易甚为严重,不仅损害吸食者的健康,而且造成白银外流,直接破坏社会生产。为挽救国家财政危机,道光帝多次发布严禁鸦片的命令,查拿烟贩,禁民吸食,对地方官查拿鸦片不力者,订立议处失察条例。1831 年,他命两广总督李鸿宾等“务将来源杜绝,以尽根株,勿令流入内地,以除后患”。1832 年 8 月,又谕令各省督抚提镇严禁陆路水师将弁兵丁吸食鸦片。但这些禁烟措施并未能遏止鸦片流毒的汹涌泛滥,清王朝统治集团内部围绕着禁烟的争论日益激化。

1836 年 6 月 10 日,太常寺卿许乃济在上奏的《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中,提出了弛禁的主张。道光帝对许乃济的主张,未置可否,只是发交两广总督邓廷桢,要他对此发表意见。邓廷桢认为“所请弛禁变通办理,仍循旧制征税,系为因时制宜起见”,建议“准照原奏”。许乃济的弛禁主张,除得到邓廷桢的附议外,“举朝无继言者”,而反对者的奏折却纷纷上达。

随着形势的发展,在鸦片贸易将导致民族危亡的严峻现实面前,特别是在广东这个鸦片走私贸易首当其冲的关口,在经过一番认真的调查研究后,邓廷桢改变了自己过去的弛禁主张,开始认真执行严禁政策。

1837 年,英国商务监督义律与鸦片贩子查顿、颠地、马地臣等人



蓄意破坏鸦片禁令，敦促英国当时的资产阶级政府派兵舰，以武力威胁中国开烟禁，扩大鸦片贸易并使之合法化。面对义律的无理挑衅，邓廷桢予以严厉的谴责，他坚持寸步不让的方针，迫使义律不得不退出广州。与此同时，邓廷桢认真组织广东水师加强海防。他通过明察暗访封闭了数百个内地窑口，捕获走私和滞留在内河、内洋的船只，禁止内地走私船和任何船只与那些长期停泊在内、外洋的鸦片趸船靠近，使英国鸦片趸船无法出售鸦片。

不仅如此，邓廷桢还督促水师提督关天培在沙角设提督署驻守，密切监视和控制中路海口，并与关天培涉海登山，周密设计虎门三道防线的建设。这座虎门大炮就是他和关天培监制的。这门大炮由纯铁铸成，体长2.5米，重3000斤，射程1000米。炮身为筒形，前小后大，两侧有耳轴，炮身上镌刻有“道光十六年七月”、“炮重三千斤”等铭文。

关天培，字仲因，号滋圃，1781年出生于江苏山阳（今淮安）的一个行伍家庭。1803年，关天培考取武庠生，升千总，历任扬州营守备、苏松镇标左营游击、川沙营参将等职。1827年，关天培被特旨补授苏松镇总兵，1833年署江南提督，在朝廷官员中颇有誉辞。

1834年，两艘英国军舰闯入广东省内河，炮击虎门炮台。为了加强海防，道光帝特授关天培为广东水师提督。上任伊始，关天培就亲往海洋内河各口岸，考察炮台，布置防务。在调查了解的基础上，他明确指出：虎门是通往广州的必经之地，东为沙角，西为大角，是第一重门户；进口不远，有横档山屹立中央，将海道一分为二，其左一条以南岸山为岸，系船只出入之道，是第二重门户；由此再进口

数里，为大虎山炮台，西面为狮子洋，是第三重门户。

为了加强海防力量，关天培把虎门炮台的大炮增加到 40 门，还在南山与横档山之间，设置木排铁链，用以阻止前来侵犯的敌船。同时，关天培加强对水师的严格训练，将虎门要塞的详图、战阵图以及有关广东海防的资料汇集成册，编为《筹海初集》四卷，体现了他关心时事，抵御侵略的海防思想。

1838 年 6 月，鸿胪寺卿黄爵滋写了一道《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的奏折，提出了严禁主张，要求以死刑来惩治鸦片吸食者。这道奏折对道光帝的震动很大，尤其是看到林则徐奏折中所说的“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时，他终于下决心禁烟，并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

1839 年 3 月 10 日，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办鸦片。邓廷桢予以积极的支持，成为林则徐在广东推动禁烟的亲密合作者。他们在短期内成功地缉拿了内地鸦片烟贩，查抄了窑口，打击和驱逐了武装鸦片趸船，在虎门亲自监督缴收了二万余箱，共计二百多万斤重的鸦片。6 月 3 日至 25 日，他们在虎门海滩进行销毁，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禁烟的正义性。在奏折中，林则徐详细叙述了在虎门销毁英国鸦片的激动人心的场面，以至于道光皇帝看得热血沸腾，提笔朱批：“大快人心一事，知道了。”

在虎门海防的建设中，邓廷桢、关天培与林则徐配合得很好，对保证虎门销烟取得成功，做出了很大贡献。正当他们加紧布防之时，英国侵略者伺机挑衅。1839 年 9 月 4 日，英国的 9 艘军舰驶抵九龙，与广东水师发生冲突，被关天培率部击退。11 月，英舰又发动



突然袭击，首先向广东水师开炮，关天培亲自督战，击退了敌舰的数次进攻。

1840年，英国政府借口“保护通商口岸”，派兵侵略中国，鸦片战争爆发。6月，英国舰队到达广州海面，因为广州军民在林则徐领导下防守严密，英军无机可乘；转攻厦门，也被击退。后来英军乘浙江防务空虚，攻占定海，并沿海北上攻占天津海口大沽。清政府被洋枪洋炮吓破了胆，把林则徐革职并派主降派直隶总督琦善代替林则徐任钦差大臣前往广东，并令邓廷桢立即由闽浙总督任内折回广东听候处理。至此，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实际上已经宣告失败。

琦善到广州后，不仅不做战备，还遣散了已招募成军的数千名水勇。1841年1月7日，英军攻占了大角、沙角炮台，虎门的第一重门户洞开，要塞失去屏障，形势十分危急。关天培深知虎门的战略地位，亲自坐镇指挥，并火速派人请求琦善增兵救援，而此时的琦善早已被敌人的炮火吓破了胆。2月26日，英军向虎门大举进攻。面对强敌，关天培毫无惧色，他身先士卒，率先死战，亲自燃放大炮，多次击退英军的进攻。终因寡不敌众，援兵不至，关天培与部下400余名将士全部壮烈牺牲。

关天培是鸦片战争中牺牲的第一位清军高级将领，他置生死于度外，以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爱国主义的赞歌，受到了后世人们的敬仰。清廷给他的谥号是“忠节”，并决定在其殉国之处建立专祠，以慰忠魂。斯人已逝，而这门由抗英名将邓廷桢和关天培监制的虎门大炮，依然留存于世，默默地见证了这段屈辱的历史。

1842年8月29日，在英国的坚船利炮下，清政府被迫签订了第

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南京条约》签订以后,各帝国主义国家纷纷效尤,通过各种手段,强迫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就是套在中国人民头上的第一具枷锁,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蔡锷将军的指挥刀

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1882年12月生于湖南宝庆的一个普通农家。他自幼聪明好学，13岁中秀才，16岁考入湖南时务学堂，与梁启超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在清王朝统治下，中国山河破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蔡锷也怀着急迫的心情，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1899年7月，“戊戌变法”失败后，蔡锷东渡日本，从此开始了“军事救国”的生涯。1900年秋天，维新派人士唐才常发动武装起义失败，英勇就义。蔡锷悲愤之余，将原名“艮寅”改为“锷”，取“砥砺锋锷，重新做起”的意思。

1901年，蔡锷进入成城陆军学校学习。1902年8月，蔡锷从陆军成城学校毕业，以候补生的身份投入日本仙台骑兵第二联队为入

伍生。1903年11月，蔡锷自费考入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不久补为官费生。1904年，蔡锷以第五名的成绩毕业。

在日本，蔡锷一面如饥似渴地学习军事知识，一面苦苦地思索拯救中华的途径。虽然他热切地希望把中国变为世界第一等强国，但还没有确立以暴力手段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思想，仍然抱着从改革军事入手，帮助清廷革除弊政，借以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

1904年初，蔡锷从日本毕业回国。他先后应聘担任江西随军学堂监督、湖南教练处帮办、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广西测绘学堂堂长、陆军小学总办等职务。年轻的蔡锷脚穿长筒靴，腰挎指挥刀，每天扬鞭跃马，指挥练兵。由于他讲解精辟，要求严格，深受广大官兵敬佩。从云南陆军讲武堂步兵科毕业之后，朱德被分配到蔡锷的部队，在他看来，蔡锷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瘦瘦的脸上，两眼相距甚宽，双颊略像女性，但口角却显得严峻、刚强。为人沉静，态度庄重……”

从日本回国后不久，云南总督李经羲聘请蔡锷担任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旅长），蔡锷开始按照自己的主张和设想，对滇军进行改造和训练。当时，云南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以推翻清王朝为宗旨的民主革命运动正在酝酿之中。大批同盟会会员和从日本回国的思想激进的青年军官，分布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和新军第十九镇中，他们活动频繁，积极策划和组织反清革命斗争。蔡锷虽未参加同盟会，受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影响，对革命党的活动给予了同情和协助。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昆明革命党人奋起响应，推



举蔡锷为临时总司令，负责拟定起义计划并指挥作战，当时他年仅29岁。起义时间原定在10月30日午夜12时，由于消息泄露，不得不提前到当晚8时40分。由于这次起义发生在农历重阳的9月9日，故被称为重九起义，其战斗之激烈，仅次于武昌起义。

在蔡锷等人的策划领导下，昆明起义军反抗清政府统治的起义告捷，成立了中华民国云南省军都督府，共推蔡锷为都督，分设参议院和军政部、参谋部、军务部等机构。蔡锷积极更新人事，革除弊政，整顿财政，兴办教育，开发实业，使云南很快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华民国于1912年1月1日宣布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但是，南京临时政府仅仅存在了3个月，政权就落到原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的手里。当时很多人被袁世凯的表象所蒙骗，不仅蔡锷对他抱有很大的幻想，就连梁启超也一度被他蒙蔽，担任了司法总长一职。

由于云南地处边陲，蔡锷感到难以施展抱负，便给梁启超写信，希望有机会走出云南。而袁世凯对拥兵自重的地方实力派始终存有戒心，蔡锷的这个想法正中其下怀，于是他下令将其调到北京，加昭威将军衔（昭威将军是“威”字号将军中排第一位），入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加以笼络与监视。

1913年10月，蔡锷到北京就任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全国经界局督办，参议院参政等虚职。在领导经界局工作的同时，蔡锷仍热心于军事学术活动，与蒋方震、阎锡山等11人组织军事研究会，深入研究各种军事学术问题。其间，蔡锷不断上书袁世凯，为国防建



设和军队建设献计献策，倾诉建设一支强大武装力量的强烈愿望。然而，袁世凯不仅不予理睬，反而倒行逆施，疯狂地进行军事独裁和复辟帝制活动。

虽然袁世凯当时的权力虽已登上顶峰，但还是有危机感。他深知在共和体制下，政党政治是大势所趋，自己只是一个过渡。于是，他企图用世袭制使自己永坐江山。自 1912 年窃据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袁世凯的政治野心不断膨胀，不仅残酷镇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打击民主共和力量，同时篡改宪法，破坏责任内阁制，强化集权统治，朝着复辟帝制的方向疾进。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所作所为使蔡锷与梁启超对他的幻想彻底粉碎。蔡锷多次与梁启超等人秘密集会，商量抵制袁世凯称帝，并初步拟定了赴云南发动武装起义的战略设想，内容是：“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

然而，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与袁世凯进行抗争，难点在于把握分寸。事实证明，蔡锷把这个分寸拿捏得不温不火，恰到好处，明知袁世凯在暗中跟踪调查，可就是不给以任何口实，让他无从下手。

当然，袁世凯也非等闲之辈，他在暗地捕捉和分析蔡锷发出的各种信息。就在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的筹安会成立不久，蔡锷在将军府领衔签名拥护帝制。同时，他还做出种种假象迷惑袁世凯，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浪荡之徒，打麻将、吃花酒。

到风月场上排遣心绪，发泄郁闷，是清末民初的士人们一种普



遍认同的行为方式。蔡锷来京以后住在棉花胡同，与小凤仙栖身的陕西巷相距不远，两人一见如故，恍惚间也就有了“古路无行客，寒山独见君”的感觉。

母亲与妻子都在身边，这对蔡锷逃出北京十分不利。因此，他有意利用和小凤仙的关系制造家庭不和的舆论，使妻子趁势带着母亲回到湖南。

眼见时机已经基本成熟，蔡锷便开始实施逃离北京的行动。1915年11月11日，蔡锷突然从监视他的密探眼中消失了！

蔡锷成功潜逃的经过神秘离奇、扣人心弦，以致产生多种传说。其中流传最广的是小凤仙掩护他逃离北京的故事。不管过程如何，蔡锷于1915年11月11日顺利逃出北京应是确切无疑的。

离开北京以后，蔡锷乘坐山东丸号轮船前往日本。为了掩护自己的行踪，11月22日他在写给袁世凯的信中以“假期已满，病仍未愈”为理由，要求“准予续假三月，俾得迁地疗养”。袁世凯的批复是：“着给假两月。”几天后，蔡锷又一次给袁世凯写信说：“兹航海东渡，赴日就医，以期病体早痊，再图报。”袁世凯批示：“一俟调治就愈，仍望早日回国，销假任事，用副倚任。”

东渡日本后，蔡锷取道上海、香港、越南河内，沿途躲过数次暗杀，历经艰险，于12月19日返回了云南。袁世凯得知这个消息以后，不由得仰天长叹：我一生骗人，不料竟被蔡松坡骗过了！

1915年末，袁世凯准备复辟帝制，自称皇帝，并成立登基大典筹备处。得知这一消息以后，蔡锷与唐继尧等人于1915年12月25日在昆明宣布云南独立，建立云南都督府，组织约2万人的讨袁护国



军。蔡锷、李烈钧分任第一、第二军总司令，唐继尧任都督府兼第三军总司令。计划第一军进攻四川，第二军进攻广东广西，第三军留守云南，寻机经黔入湘，尔后各军在武汉会师北伐。另由都督府左参赞戴戡率一部兵力入黔策动起义。出征前，蔡锷在云南向滇军将士沉痛致辞：“袁势方盛，吾人以一隅而抗全局，明知无望，然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此次举义，所争者非胜利，乃中华民国四万万众之人格也。”

当时，对于是否能打倒袁世凯，蔡锷并无把握。然而，为践行“为四万万同胞争人格”的誓言，他组织云南官兵发动了护国战争。

蔡锷领导的护国军以弱于敌人的兵力，在饷弹两缺，后方接济时断的情况下，与号称精锐的北洋军奋战数月，牵制住了敌军主力，有力地配合了其他方向的军事行动，推动了全国反帝制运动的发展。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并于6月6日死于全国人民的唾骂声，时年57岁。直到死，袁世凯都不能理解蔡锷反对他称帝，居然不是为了一己的野心，而是“为四万万国民争人格”，“人格”一词在袁氏的辞典中是找不到的。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民国大总统，任命蔡锷督理四川军务，但这时蔡锷的病情却开始恶化。早在北京时，蔡锷便已染有喉疾，千里奔波回到云南以后，体质更为虚弱。尤其是率领护国军作战时，蔡锷身负指挥军事、筹措军饷等重任，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战斗在第一线，夜以继日地工作，致使健康状况日益恶化。

在处理好四川省善后事宜之后，蔡锷即于9月东渡日本治病，



进入福冈大学医院治疗。起初的治疗已初见成效，然而在10月31日，中国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黄兴不幸在上海病逝。这一噩耗使蔡锷悲痛至极，其病情也迅速恶化。11月8日上午，终因医治无效，蔡锷病逝于日本福冈医院，年仅34岁。

蔡锷逝世的消息很快从日本传到北京及全国各地，举国上下，同声哀悼。当时的民国政府在北京中央公园为蔡锷举行了隆重的公祭，黎元洪、孙中山、段祺瑞等政界首脑以及各界群众前去参加祭奠，灵堂大厅摆满了花圈和挽幛。孙中山写的是：“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梁启超写的是：“国民赖公有人格，英雄无命亦天心。”

在公祭大会开到一半的时候，一身白衣的小凤仙悄然而至，送来了两副挽联：

其一为：不幸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

其二为：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那堪忧患余生，萍水姻缘终一梦；几年北地胭脂，自愁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

蔡锷抱病奋斗，舍己为国，在困境中奋起，在胜利中永诀，自然令后人感佩景仰不已。而小凤仙虽为沦落风尘一女子，然因缘际会，更使得她与蔡锷的故事成为不可多得的人间绝唱。

1917年4月12日，蔡锷魂归故里，民国政府以国葬的仪式把他安葬在湘江边风景秀丽的岳麓山万寿寺的后山。